

忠贞史乘现势 无庸纵横捭阖 ——读《关于土族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有感

李克郁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关于土族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就土族史研究中一些问题的论述、所言值得深思,该文把津革思汗当成吐谷浑人、把土族李土司当成西夏王族后裔、把驸马长吉当成翁吉刺人、把土达及土人当成吐谷浑,显然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关键词:土族史;研究《若干问题》;蒙古;吐谷浑

中图分类号:K2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227(2012)01-0046-07

2005年初,《青海民族大学学报》(以下简称《学报》)编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告诉我,关于土族的历史来源问题尚未得到学术界的统一认识,《学报》准备组织稿件,开辟专栏进行讨论。这是件好事,笔者表示赞成、支持,并多有期待。当年年底《学报》第四期发表了《关于土族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若干问题》)一文,并附按语说“纵观近年来土族族源问题研究,大致形成两种观点,一是‘吐谷浑’说,一是‘阴山达达——蒙古人说’。持上述观点者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本期特刊出陕西师范大学吕建福教授《关于土族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旨在进一步推动土族历史的研究工作,我们真诚地欢迎学界同仁赐稿。”这是一个求真务实的按语,充分表达了《学报》编辑部对学术问题的认真、谨慎、求实的科学态度。因为当时的背景是:一方面《土族史》正式出版,土族研究会召开发行会,认定其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并表彰和奖励了作者,甚而向社会正式宣布:今日土族就是晋永嘉时吐谷浑的后裔,其意是土族历史问题已确定,学术界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照此办理就是了。第二,之后学术界相继出版了《河湟蒙古人》^[1]、《甘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2]、《青海通史》^[3]、《西宁历史与文化》^[4]、《甘青边界蒙古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5]、《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互

助县·土族卷》^[6]等著作,并发表了不少有关土族历史来源的论文,对土族的历史渊源问题得出与《土族史》截然不同的结论。2008年出版的《青海省志·民族志》也未采纳土族就是吐谷浑后裔^[7]的观点。至于广大土族同胞,也不认同《土族史》的观点,说该书是一本与土族无关的史书。一位学者著书说,土族的精英们以吐谷浑为先祖在构建自己的历史,而草根阶层并不认同,而是认为自己源自蒙古。^[8]

鉴于上述实际,《学报》编委会专设平台,鼓励学术界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土族历史开展广泛调查,深入研究,各述己见,进行有益讨论,很显然,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若干问题》发表后的势态令人失望,没有人就此发表评论,反而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传言“不同意吐谷浑说就好比蚍蜉撼树,太岁头上动土”等等。还有一位外籍学者问我:“你们的祁土司为什么是吐谷浑?佑宁寺供的尼达为什么不是蒙古人?”我只好回答说“我不清楚,应该有清楚的人,烦请问他们。”特别是《若干问题》将所谓的李某的问题(文中20多处点名)不仅宣传到国内,而且宣传到国外去,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好奇。此外,还有一些流言,有的实难启齿,故不再一一赘述了。

《若干问题》发表已有六年,这是笔者缄默的六年,其原因不在于被《若干问题》“批得哑口无言”,而在于笔者的《河湟蒙古人》已出版,该说的都说了,

收稿日期:2011-10-19

作者简介:李克郁(1934-),男,土族,青海互助人,青海民族大学教授。

决定不再涉足土族历史研究,罢笔歇息,安养晚年。六年后的今天,笔者虽疾病缠身,多有不便,又有医生“不读书、不写字、不动脑、不激动、不吸烟、不饮酒和少吃肉”的“六不少”禁令,但鉴于近来一些关心土族问题、又不知情的同胞提出要我表态,无奈之下只好提笔就《若干问题》一文谈几点感受。从总体上讲,《若干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与学术有关的内容;一是与学术无关的内容,二者各占一半。至于多余的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笔者并不介意,言论自由嘛。下面就学术方面的问题提出几点质疑。在此有必要特别申明一点,鉴于有人曾给笔者扣上“从个人主观愿望和个人感情出发,违反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等多顶帽子,为了避嫌,不得不多摘一些作者的原文,请读者见谅!

(一)《若干问题》在文首的摘要中说“本文针对土族族源讨论中的诸多问题,从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民族理论、民族名称、方法论等六个方面对阴山达达——蒙古学进行反驳,认为不论史实考证还是民族学理论来说,该说都不能成立,由此反证吐谷浑说的正确。”^①很显然,作者十分自信。对此,笔者表示理解。然而,过分自信就有违反科学之嫌!还是拿事实说话。什么是历史学?过去的现实是今日的历史,今日的现实又是未来的历史,历史学就是要把过去的现实如实地展现在今人面前的学问,它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虚构的过去绝不是历史。民族名称是在该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是约定俗成、并为该民族的全体人民所公认的,它是研究该民族历史的活化石。民族名称一旦形成,就不会变来更去,也无此必要。土族历史上有很多名称,如:蒙古尔(mongol)、察罕蒙古尔(qagaan mongol)、霍尔(hor)、达勒达(dolda-doldo)、土达、土人等。蒙古尔是土族的自称,此称与蒙古人的自称一致;察罕蒙古尔(白蒙古、白达达)也是土族的自称,这一称呼只在与蒙古人需要区分的特殊场合才使用;霍尔是藏族对土族的称呼,从藏文古籍和现今学者的调查研究来看,霍尔人就是蒙古人;达勒达、土达、土人是汉族对土族的称呼,也是指蒙古人(这个问题将在后文详述)。可见,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对土族各有其称呼,故给人以名称繁多、纷繁复杂的感觉,但经过仔细分析后,其实所有名称都特指蒙古。至于“土昆”,一位土族学者说“民和土族从不自称‘土昆’,对此,我可以作证。”笔者曾在中科院工作,于1955年至1980年先后五次去民和调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每次去官亭至少滞留三个月,也没有调查到“土昆”一称,所以这个词似为《若干问题》的作者所创

造,不在讨论之范围。至于“阴山达达——蒙古人”,提法不确,笔者《河湟蒙古人》一书对此有如下叙述“在这三种观点中,沙陀突厥说可以归入蒙古说,因为这种观点旨在试图说明土族的成分中有沙陀突厥成分,而沙陀突厥早被蒙古化,亦算蒙古人,故与蒙古说并不冲突”。^[9]

(二)《若干问题》说“明清时期的土族土司乱定族属是个普遍的现象,或为沙陀族,或为蒙古族,或为维吾尔族,或为阴山达达族,在他们的文字间土族完全被肢解,似乎就没有谁是土族。”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学者们为什么没有人说吐谷浑的?一的确是把土族肢解得七零八落了,但为什么发生此种怪事?《若干问题》的作者确实不知其中的原因呢还是有意装作不知?作为研究土族的人若说不知内中详情,实不可信。改变民族成分的事发生于1980年后,究其原因,功在《土族简史》^②。笔者曾问改变民族成分为蒙古族的部分东祁、西祁、阿氏民众“你们原来和我们一样是西宁土人,土族、蒙古族都是少数民族,为什么改变民族成分为蒙古族?”他们的回答基本一致,而且不加思考地说“土族是吐谷浑,我们是蒙古人,与吐谷浑没有关系,所以改变了民族成分。”鲁氏人则说“我们鲁家人是成吉思汗六太子阔列坚的后裔,是蒙古人,如果强迫我们改祖,我们也只好走祁家人的路了。”至此,笔者颇有感触,一种错误的说教把一个民族弄得七零八落,惨矣!这正是:君者欲游昆明湖,却是西向青藏路。李鲁阿祁离我去,只因换祖吐浑故。更史改乘何来史,易宗换祖祖亦无。

不难看出,吐谷浑说宣传得越起劲、越广泛,土族被解体的也就越快、越彻底,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另外,三李土司的人也已放出话来:我们既不是党项,更不是吐谷浑,而是蒙古化的沙陀突厥人,蒙元时期来到西宁镇守的,说李土司是吐谷浑,“完全是不严肃的臆想、猜编、胡言、乱语罢了,无任何史实根据,无任何史料可言”。^③李、鲁、阿、祁等土族18土司究竟有多少人呢?根据许让神父20世纪初的统计,除70户缠头族(指治土司20世纪50年代确定民族成分时定为回族)和471户番人外,出自蒙古的蒙古尔人有5627户,出自沙陀的蒙古尔人5303户,计10930户,按每户五人计,则蒙古尔人共有54650人,这个数字与解放初期的统计数基本一致。^[10]如果迫使他们改变民族成分,哪还有什么土族可言!回顾1980年前的研究情况,不管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都把土族当作一个独立的民族进行研究,只是到了1980年以后,由于《土族简史》的误导^④和个别人的

无限发挥,导致土族史的研究处于混乱状态,肢解民族之事由此产生,且愈演愈烈。照此发展下去,其结果不言而喻。

(三)《若干问题》说“明代以来的金石碑铭和家谱资料充分表明,李土司出自西夏王族,西夏末期由灵州移居西宁,可以说这是确定无疑的”。这里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第一,《若干问题》的作者曾经在所谓构建《土族史》基础理论的《土族为吐谷浑后裔新证》^[11]一文中肯定地说:所谓李晋王就是指吐谷浑本人,土族李土司为吐谷浑后裔。但在《若干问题》中却变成了西夏王族,并且说确定无疑。为何如此多变?所谓西夏王族是指以赵思忠为先祖,景宗赵元昊至末主赵昀一系,赵氏不是吐谷浑,而是党项族。在这里确定无疑的吐谷浑人变成了确定无疑的党项人了,实在是令人“折服”!第二,如果说土族李土司源自吐谷浑,而且是西夏王族,则李培业之父李鸿仪于1923年至1961年间写的党项家谱如何证明李土司是吐谷浑后裔而不是党项后裔?李培业先生也不是已拒绝作证吗?第三,李培业先生保存的家谱经西夏史学家鉴定予以否定。白滨先生于2000年为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八次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中说“首先是与西夏王族或西夏遗民无关的族谱,即1994年末国内新闻媒体曾经吵作哄传一时,‘发现’‘大夏皇族世谱之事,是靠不住的,其关键是该族谱中记述的西夏末帝李昀有无子嗣,以及李昀与‘赏哥’的所谓‘父子传承’不能成立,则西夏皇族后裔云纯属子虚。”“赏哥为夏末帝李昀之子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12]一生研究西夏史的李范文先生也写道“我对他究竟是否是南平王,西夏末帝李昀的后裔,仍然存疑。”“例如上面已谈,在族源上有意高攀,从赏哥至南哥,在正史上尚未找到佐证。”^[13]我省已故赵盛世、李文实二位老先生也曾撰文肯定李土司先世为西突厥的一支,原游牧于阿尔泰山一带,号沙陀,姓朱邪,后归唐并多有功劳,克用因救昭宗进封晋王,为李唐社稷抛头颅,洒热血,忠心不二,其子李存勖建立后唐。蒙古兴起,归附蒙古,随蒙古军驻防青海,明清又特有功伐,衍为今世青海东伯府、西伯府二土司,在西北历史上代有勋绩,著有声名。李文实先生还拿出古人赞沙陀的一首咏诗《三垂岗》:“英雄立马起沙陀,岂奈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岗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李家人珍藏有毛主席对此诗的亲题墨宝。第四,西夏王族吐谷浑说无任何根据,只是作者自己说自己的话。李土司为党项说不仅为西夏史学家们所否定,而且作

者自己也以“所谓李晋王子也显然是指吐谷浑本人”一说予以否定。至此,李土司之党项说不能成立,李土司之吐谷浑说也已否定,那么下一步作者给李土司找一个怎样的祖先呢?第五,1372年,西宁州同知李南哥归附明朝并向朝廷表明自己的身份“自云李克用裔”;《西宁府新志》云“李南哥,西宁土人,本沙陀李氏”;《碾伯所志·人物志》云“李南哥,系出沙陀李氏”;《西宁志·土司》:“李天俞,西宁卫人,唐仆射李克用裔”,时至今日,在青海西宁地区有沙陀李氏三房二十七门的人近10万人,^⑤却不见一个吐谷浑人,也不见一位翁吉刺人,这一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李氏察罕帖木儿、南哥、坚赞三房二十七门之后裔有200-300部家谱,均言李氏为唐仆射李克用裔,李氏所在地多有祠堂,每年都举行祭祀活动,届时请出晋王李克用的巨幅画像,供李家子孙膜拜。难道强制李家人改换祖先吗?建议不要拿与李家无关的吐谷浑、翁吉刺说来干挠他们平静的生活。

(四)《若干问题》择录了胡璉器所撰《湟中华胄寄彦才祁氏世系略纪》之一段话“吾祖之兴也,在唐宋为扎萨免津革思汗,入元封金紫万户侯,铁券金印,子孙世守焉。至巩哥星吉者,官甘肃理问。”接着作者继续写道“可见所谓元朝后裔,元裔的说法并没有根据,从中也推理不出其族属,因为在元朝任职的各个民族都有,不惟蒙古族!实则西祁土司的族属《西宁府新志》有明确记载,说贡哥星吉之孙祁贤为‘西宁土人’,其孙为土族,何来祖父为蒙古族!”这段话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是说祁贤为吐谷浑,则其祖父贡哥星吉、先祖津革思汗自然是吐谷浑。读了这段文字后,令人瞠目结舌,不知该说什么好,难道作者真的不知道津革思汗是谁吗?津革思汗是一位世人皆知的人物。1204年,帖木真和阿剌忽失(白达达首领,其意为alag xuu,五色鸟)联合起来打败了蒙古草原上颇有势力的突厥乃蛮部,蒙古草原终于统一在帖木真的旗帜下。1206年,在斡难沐涟召开各部族大会,建九旂白旄,商议汗号,帖木真要立国登基,当时帖木真的安答(anda、契友、盟友)、忽答(guda,亲家)、白达达首领(突厥种)阿剌忽失(五色鸟)就坐在一块方石上,他说:“蒙古国像大海一般宽广无边,蒙古国拥有大海一般不竭宝藏,蒙古国像大海一般百川归流,帖木真就是我全蒙古的津革思汗,于是,众首领高呼津革思汗!津革思汗!后来以汉字书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津革思)是大海的意思。这件事在蒙古历史上成为一则美妙的故事。说:帖木真在斡难沐涟召开各部族大会,告天极位时,一只

五色鸟(alag xuu)落在一方石上发出“津革思、津革思”的鸣叫声,于是众首领纷纷认为这是腾格里的旨意,众人大呼帖木真为“津革思汗”。“津革思”这个词是突厥语,这一汗号的提议者也是沙陀突厥阿剌忽失(alag xuu 五色鸟)。若按《若干问题》作者的逻辑,元太祖成吉思汗也成了吐谷浑了!实不可思议。

(五)《若干问题》说“土人、土民是宋代以来的土族名称,鲁土司家族及其所部之土人族属无可置疑”。鲁氏脱欢是成吉思汗六太子阔列坚的后裔,阔列坚由成吉思汗和他的爱妃忽兰所出。大汗西征时带在身边的正是这位妃子。关于这一点,《甘肃民族源流》、《甘肃边界蒙古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结构》和鲁氏家谱已被证实。如前所述,作者竟把元太祖成吉思汗当成吐谷浑,至于将其后裔当作吐谷浑,也就不足为怪了!

(六)关于隆务河沿岸的土族,或曰定居于参卜郎的土人,是吐谷浑吗?非也!近年来学者们多有调查研究,认为他们是蒙古人。马成俊博士写道:“蒙古族不断入居隆务河流域,现今居住于隆务河中游一带的年都乎、郭麻日、尕沙日人自称成吉思汗御下多达那波汗四军团霍尔美赤裤勇猛者的后裔”。^[14]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博士菅志翔、马艾写道“从人口来源看,四寨子都是移民。最早的移民可能两种人,一种是蒙古军队,他们是在这个地区具体行使王朝权力的人,军人当兵食粮,他们的家属就地屯垦。另外一种人是自发迁移过来的农民,他们是作为牧业经济的必要补充定居此地的。”“四寨子的族群归属既不属于番,也不属于汉,而是‘朝廷的人’”。^[15]藏族学者索端智博士经实地调查后写道“蒙古族的大量移入,使隆务河流域的民族融合不断深入,至今这一地区的地名、语言和服饰都有很多受蒙古族影响的痕迹。如地名中有霍尔瓦加、霍尔措玉、黄乃亥等。‘黄乃亥’意为黑蒙古,相传他们曾是蒙古族,因住黑帐房而得名。”^[16]学者们无一例外地共同确认,定居于隆务河沿岸的土族人不是吐谷浑,而是蒙古人,是“朝廷的人”,这与《元史》所载元宁宗懿璘质班时期从永昌派一支蒙古军去守卫参卜郎之事相一致。这支军队中蒙古人1000人,维吾尔(即尧呼儿)人500人,他们至明代仍为军户。由上可知,同仁地区的土族(土人、保安土人)也与吐谷浑无关。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作者把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都纳入吐谷浑之中,因为他们是东乡土人、保安土人、甘凉土人。然而,学者们包括这些民族的民众认为,东乡族是桑塔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组成的;保安族是突厥人和信仰伊斯兰教

的蒙古人组成的;裕固族是古回纥(尧呼儿)和蒙古鹵王出伯部后裔组成的一个新型民族。^[17]甚至民国初年第一任青海省主席(总兵官)马福祥也承认,他祖上是东乡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凡此种说明,上例土人显然与吐谷浑无关。

(七)宁濮郡王驸马昌吉(长吉)之先祖究为何族?《若干问题》未加任何考证地沿用了屠寄之说。实际上,屠寄犯了个错误,他把汪古部(白达达)的赤古、爱不哥(《元史》亦作爱不花)、怀都、昌吉等列在翁吉刺德薛禅家族中,而且是断代的。查阅《元史·德薛禅传》后,这个疑窦豁然解,上列各历史人物绝不是翁吉刺人,而是汪古特(白达达)人。赤古是阿剌忽失兄也这(或曰亦苏亦)的儿子;爱不哥(《元史》作爱不花 alag buha,花公牛)是阿剌忽失孙,拜哈(亦作李要合)子;昌吉是拜哈曾孙,拙里不花(gul buha,冬天的公牛)孙,火思丹子;怀都是拜哈曾孙,君不花(jun buha,夏天的公牛)孙,囊家台子;马札罕和怀都是亲兄弟,与昌吉是堂兄弟关系。显然,赤古和拜哈,还有拜哈之兄不颜昔班之间均是堂兄弟关系。因此,屠寄所说上列人物的关系除个别错位外都是一致的,这也是屠寄将白达达人列入翁吉刺的一个明证,现今个别人照抄屠寄之言,必然会以讹传讹。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有关赤古之事。白达达(汪古部)是金国的属国,其首领亦苏亦摄政时期,他的儿子赤古在金国。赤古留在金国,对亦苏亦而言,表示白达达作为金的属国,对金一心不二,忠诚服务;对金而言,赤古之存在对白达达的叛复勿需担忧。可见,赤古就是白达达在金的人质。亦苏亦死后,白达达贵族中与亦苏亦相好的人以父死子袭的习俗,请赤古从金国回来继承父业。赤古自金抵达白达达后,听到部分仇视亦苏亦的贵族们将赤古的叔父阿剌忽失扶上了台,作为白达达部长,无奈之下暂住于婶母阿里黑帐下,阿里黑是阿剌忽失的妻子,她收留了这位失去了继承权的侄子。不久,那些曾经主张按习俗由赤古继承其父业之事未成,后又主张与乃蛮联手,合力抗击成吉思汗的贵族们因政见之不同,杀了阿剌忽失和成吉思汗的女婿不颜昔班。于是,阿里黑惊恐万分,携其幼子拜哈(李要合)和侄子赤古夜遁云内(今内蒙古自治区萨拉旗)藏匿起来。成吉思汗的蒙古军下云内,觅得阿里黑等人,甚为高兴,赏赐甚厚。不久,那些杀害阿剌忽失和不颜昔班的贵族们也得到了严厉的制裁。当时拜哈尚幼,乃封赤古为北平王,统领白达达,并以蒙古、突厥之习俗,将守寡的阿剌海别乞嫁给赤古。1219年,成吉思

汗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赤古率万骑与木华黎国王经略中原,而阿剌海别乞为漠南监国,史称监国公主。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军凯旋返回蒙古本部,此时赤古已亡(不知亡因),监国公主阿剌海别乞寡居,随军西征的拜哈已年17岁,达到了执政年龄,故继北平王,率白达达万骑,以兄死妻嫂的习俗娶阿剌海别乞为妻。^[6]1227年,成吉思汗复仇的剑指向了曾经反复无常、拒绝出兵西征,并恶意中伤成吉思汗的西夏人,他嘱咐将领大臣们说“自唐兀惕(西夏)百姓之父母,直至其子孙之子孙,尽殄灭无遗矣”。^[18]其后的历史告诉我们,他的大臣及将领们忠实地执行了他的遗言。西夏的统治者给党项人招来了空前的灾难,致使西夏文明彻底毁灭。可以断定,在灭夏的过程中,成吉思汗驸马拜哈所率之万骑亦参加了战斗,灭夏后又留居于那里。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从1271年始,周游全中国,他在贺兰山一带见到了很多白达达人,这些白达达人当然是1227年进入此地的。根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二年(1275年)三月,安西王忙兀剌、诸王只必帖木儿、驸马长吉(亦作昌吉)分遣所部蒙古军从西平王奥鲁赤(忽必烈七子)征吐蕃。长吉就是白达达人,是驸马拜哈子拙里不花的孙子。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封驸马长吉为宁濮(宁,即宁州,濮即濮州,皆在今甘肃庆阳之地,唐为羁縻州)郡王镇西宁,并以西宁州为长吉之封地。这是白达达人从宁夏进驻湟水流域之始,自此西宁州一直由白达达人经营,这些白达达人当然是蒙古化的突厥沙陀人,是蒙古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元亡明兴,西宁州同知李南哥举旗归明,向明廷自报家世曰“李克用裔”。^[7]沙陀人开发湟中,保卫边陲,繁衍生息近800年,发展至10万人之众。鉴于上述,说李土司是西夏王族,实乃天方夜谭。

(八)《若干问题》一文的作者认定明清时期的土人、土达都是吐谷浑,并将土族的李、鲁、阿、祁、汪、赵、甘等18家土司(西宁地区16家,连城1家,参卜郎1家)均归入吐谷浑。关于这个问题,为避所谓“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张冠李戴”之嫌,还是以学者们,包括《若干问题》作者的研究结论为依据。首先《若干问题》的作者在他那称之为《土族史》基础理论的《土族为吐谷浑后裔新证》一文中说“凡明代称为‘土达’者,至清代均作‘土人’,亦明土达即是土人。如明代文献所称‘土达’金刚保、清代文献称土人,《西宁府新志》、《碾伯所志》均称其子朱荣‘西宁土人’。又如明代文献所称河州‘土达人户’、‘多是土达’者,清代《秦边纪略》则称‘其土人甚盛’。”^[19]“可见,明人对土族及其‘土达’的专称是

非常明确的,这也说明‘土达’即‘土人’的异称”。^[20]土达、土人为同义语的结论当然是正确的,无可挑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史学家郝时远和任一飞先生也确认明代汉文记载中的“土达”、“土人”(或称“达民”、“土民”等)与今天的土族是一脉相承的。写道“由于许多汉文记载明确表明,明代史籍中所谓‘土达’‘土人’均系元代蒙古遗裔及明初由塞外归附的蒙古人……”^[21]秦永章经考证后认为“达”、“达达”毫无疑问是指蒙古,在“达”前加一“土”字,即表示为土著的、定居的、世居其地的蒙古,以此区别于游牧的,逐水草而迁徙的蒙古。”^[22]“……散居于甘宁青地区,被称为‘土达’、‘达民’、‘土人’及‘土民’^[23]的蒙古族遗裔,由于长期脱离其民族主体和原居的草原地区,在元朝灭亡后丧失了其统治民族优越地位,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青海通史》的主编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也认为明代一些志书中的“鞑鞑”、“达达”、“达民”、“土达”、“土民”、“土人”等名称一脉相承,皆指蒙古人。^[24]即使很长一段时间坚持吐谷浑说的牟一之先生也写道“由蒙古壮丁组成的队伍叫土达官军。”^[25]而且把土族的东祁、西祁、鲁氏、阿氏等土司均列入蒙古族中。由上可知,无论持蒙古说的学者,还是持吐谷浑说的学者,都认为蒙古、达达、土达、土人、土民都是一脉相承,这是学者们的共识,以形式逻辑而言,应该是:

因为:蒙古=达达、土达

达达、土达=土民、土人

所以:土民、土人=蒙古

那么,《若干问题》的作者因何对学者们已经取得的共识视而不见,又把上述名称与毫无相干的吐谷浑拉扯在一起!何况作者本人也未曾有过异议!

至于《若干问题》的作者长篇大论的民族学、文化学、民族理论、姓名学、方法论等,笔者所知无几,故无从评说,然而庆幸不知!

最后,笔者还是以史学家们的话来结束本文。著名史学家《中国通史》的作者,北京大学教授范文澜先生写道“鲜卑吐谷浑率所部700户西迁”^[26]，“少数慕容部贵族与众多羌族部落酋长融合成为一个统治阶级,鲜卑人羌化了。因之,吐谷浑国实际是羌族的国家。”^[27]“羌族从一百几十个聚散无常的原始部落进而组成吐谷浑、苏毗、吐蕃等国家,又从这些分离的国家进而组成统一的吐蕃国,都是划时代的大发展。”^[28]“羌族在青海建立吐谷浑国,是社会发展中一个光辉的标志”。^[29]“吐谷浑是羌族的国家”。^[30]我省藏学家黎宗华、李延凯在他们的《安多

藏族史略》^⑧一书中说:“……至此,统治青、甘部分地区达350年之久的吐谷浑王国宣告灭亡。青、甘地区成为吐蕃人的天下。在这一系列重大历史变革中,鲜卑秃发人、吐谷浑人、吐蕃人逐渐汇入青、甘藏族大家庭。”阿顿·华多太在他的《羌和吐谷浑、元昊之我见》一文中写道“吐谷浑这个词是藏语‘特卧羣’,‘特’在藏语中为‘厉害’、‘能敌’之意,‘卧’为‘王’之意,故吐谷浑的正确含义为‘能王’或‘胜王’。这个词与鲜卑语吐谷浑是一种巧合”^[31]。“吐谷浑国是鲜卑人为首领,羌人为臣民的国家”^[32]“有关对吐谷浑的后裔为当今土族的说法无任何道理。因为土族也像历史上的羌一样并不把自己称为‘土人’而称为蒙古尔,有些蒙古人称土族为‘察罕蒙古尔’(即白蒙古,蒙古族的一支),况且其语言除夹杂了藏语和汉语外,仍无异于蒙古语,岂止说两者之间雷同的传说。”^[33]史学家崔永红在《草原王国吐谷浑》一书里亦写道“曾在我国西北繁衍生息了约700年的吐谷浑人渐行渐远,渐行渐远,在历史的舞台上慢慢远去了,他们那模糊的背影逐渐隐没在了广阔无限的历史时空之中”^[34]使我们吃惊的是吐谷浑灭亡1300多年后,某些人独出心裁,不顾国内外学者百余年来研究的成果,也不顾近些年来许多学者的探索,一意孤行,试图复活吐谷浑,并以祖先供奉之,难免成为人们的笑料……

湟北著名寺院佑宁寺和土族各村庄的寺庙中供奉膜拜的尼达桑、拜哈桑都是土族人民祖先崇拜的标志,任何人都不可能用吐谷浑的塑像去更换这些神佛;亦无法改变汉藏文史籍的明确记载;不能改变李、鲁、阿、祁等各家土司的家谱;更不可能改变土族人自称蒙古尔,口操蒙古语族语言的现实。为此,奉劝《若干问题》的作者:就此止步!如果继续坚持津革思汗是吐谷浑人,则请与蒙古学家们讨论;如果继续坚持李土司是西夏王族后裔,则请与西夏史学家们讨论;如果否定自己确认的土达、土人为同义语的结论,反而坚持土达、土人为吐谷浑的话,则与前文列举的任何一个人讨论。笔者已完全表明了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就此决定退出与吐谷浑说者们进行的毫无意义的对话。至于孰是孰非,让现今的年轻学者和未来的学者们去评判吧!科学研究追求的是真理,因此,不能脱离史实与现实,也不能脱离群众!不要把土族并入其他民族中,从而留下终身遗憾!

注释:

①“阴山达达——蒙古说”之提法欠妥,因为我

们所说的阴山达达或沙陀突厥是蒙古化的突厥人,是蒙古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融合为一体的,故蒙古说中就包括了沙陀突厥人。

②《土族简史》是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由《土族简史》编写组编写,青海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11月出版,在这本书中认识到历史上的霍尔人(藏族对土族的称呼)与土族的关系密不可分,或曰历史上的霍尔人就是现今土族人的先民,但是《土族简史》在毫无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从主观判断出发确认霍尔人为吐谷浑,由此人云亦云,土族史的研究走上了违背科学的道路。

③李土司高阳伯五门裔李永瑜先生于1994年10月,出版了他的《沙陀李晋王及其后裔》一书,其后相继出版了《沙陀李晋王及其后裔》一书的更正与补充之(1)、(2)、(3)、(4),其中(3)是由东伯府土司子李鸿发,西伯府土司子李永祯,高伯阳五门裔李永仪、李永瑜、会宁伯四门裔李鸿雁、李大业、李坚赞长孙裔李永祥共同撰写,对所谓李氏为《西夏皇族后裔考》用大量的事实进行了最严厉的批评;(4)中主要叙述沙陀附蒙古及进驻西宁的过程,并认为沙陀就是蒙古的主要组成部分。

④于1982年出版了《土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土族简史》,该书《第一章 概述》中说“土族自称各地不一,互助、大通、天祝一带自称‘蒙古尔’(mongol)、“蒙古尔孔”(mongol kun),意为蒙古人,“察汗蒙古尔”(qagan mongol)意为白蒙古,民和三川地区则多自称‘土昆’。甘肃卓尼地区则多自称‘土户家’。藏族称土族为‘霍尔’(hor)。汉、回等称土族为‘土人’、‘土民’。汉文史书上称土族为‘西宁州土人’、‘土民’”。上述这段总述基本正确,只是卓尼人是藏族还是土族,尚有不同见解,而“土昆”一称只是某些人的独创,实无此称。因之,由上只能得出现今的土族就是由蒙元时期驻河湟地区的蒙古部众发展而来。但《土族简史》毫无道理地与吐谷浑拉扯在一起,这就是严重的误导,由此土族社会出现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

⑤见李氏会宁伯、高阳伯、坚赞之后裔李鸿雁、李鸿发、李永祯、李永瑜、李永义、李大业、李永祥等撰《沙陀李晋王及其后裔》一书《更正与补充之三》,单行本2000年7月,西宁。

⑥有关赤古一案,法国著名蒙古史学家雷纳·格鲁塞著,龚铨译,翁独健校《蒙古帝国史》中有详尽的叙述,赤古就是白达达汪古部人,是阿剌忽失兄亦苏亦之子,其注释云:某些手抄本作chikoun,参阅拉施特“部落”别列津译,第115页。有一科手抄本作

chikoui, 见《蒙古帝国史》, 商务印书馆, 2003年北京, 第173-175页。

⑦昇允, 长庚修, 安维峻, 纂《甘肃新通志》云: “李南哥, 西番人, 白云李克用裔, 元西宁州同知, 洪武初归附, 授指挥僉事世袭”。又《西宁府新志·献征志·人物》载: “李南哥, 西宁土人, 本沙陀李氏, 元西宁州同知, 洪武四年以州归附, 授西宁州镇抚指挥”。

⑧黎宗华, 李延恺《安多藏族史略》, 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 1992年8月, 第18页。该著第89页根据藏文的记载, 对土族土司的来历有如下叙述: “阔端为了直接统治广大藏区, 便命其近臣充任地方首领, 如西宁地区之吉土司、李土司、杨土司、祁土司、连城的鲁土司、以及纳土司等皆系阔端属臣, 而且均系蒙古贵族”。

参考文献:

- [1][9]李克郁, 李美玲. 河湟蒙古尔人[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9-30.
- [2][22][23]秦永章. 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 114-116. 114-116. 114-116.
- [3][24]崔永红, 张得祖, 杜常顺, 主编. 青海通史[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68.
- [4]半一之, 主编. 西宁历史与文化[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5.
- [5][10][比]Louis schram, 著. 李美玲, 译. [美]Robert Ried heather Fried 校. 甘青边界蒙古尔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7: 30.
- [6][21]郝时远, 任一飞, 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土族卷·互助县[Z].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17. 17. 17.
- [7]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青海省志·民族志[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 [8]祁进玉. 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90. 91.
- [11][19][20]吕建福. 土族为吐谷浑后裔新证[J]. 西北民族论丛, 2001(1).
- [12]白滨. 西夏遗民述论[J]. 民大史学, 1997(2).
- [13]李范文. 西夏皇裔调查纪实[J]. 宁夏文史, 1995(1).
- [14]马成俊, 主编. 神秘的热贡文化[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13. 227.
- [15]菅志翔, 马艾. 四寨子的族群演变[J]. 青海民族研究, 2006(2).
- [16]索端智. 元明以来隆务河流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共享[J]. 青海民族研究, 2001(3).
- [17]参阅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 编. 甘肃少数民族[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 转引自胡国兴编. 甘肃民族源流[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 1991: 12.
- [18]蒙古秘史·续集卷二[Z].
- [25]半一之, 主编. 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 46-51.
- [26][27][28][29][30]范文澜, 主编.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三编二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45. 446. 447. 454. 454.
- [31][32][33]阿顿·华多太. 羌和吐谷浑元昊之我见[J]. 青海民族研究, 2003(1).
- [34]崔永红, 胡芳. 草原王国吐谷浑[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37.

(责任编辑 杨卫)

Thoughts On Several Problems about The Research of Tu Nationality's History

Li Ke-yu

Abstract: The article, Several Problems about The Research of Tu Nationality's History, regards JingGeSiHan as TuYuHun people; Tu nationality Lee Toast as the descendant of Xi Xia Royal Lineage; Changji, the husband of the emperor's daughter, as WenJiLa people; TuDa, TuRen as TuYuHun, which made some mistakes of common sense.

Key words: Tu nationality; historical research; TuYuHun; Mongolian people